

“双碳”战略下文化产业绿色发展的 面向与路径

——数字治理的视角

张 铮 刘钰潭

摘要: 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许多“高碳陷阱”,集中表现在以文化攀比为实质的低质型高碳现象、以文化模仿为实质的隐蔽型高碳现象和以文化浪费为实质的粗放型高碳现象,上述现象是由文化产业发展中本土特色的模糊、决策科学性的忽视、发展的制造业思维导致的。数字治理视角与绿色发展理念为文化产业解决高碳问题提供了指引,“双碳”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平台:文化产业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发挥数字化战略的顶层引领,实现智能治理,培育城乡科学布局的空间思维以避免无效竞争,积极转变文化企业经济增长模式,推动绿色生产加速,通过构建绿色消费习惯实现文化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文化产业的绿色发展也应进一步科学审视技术、消费者、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警惕过度数字化带来新的高碳现象。

关键词: 文化产业; 绿色发展; “双碳”战略; 数字治理; “高碳陷阱”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3.06.004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①。近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许多传统文化在与创意元素的相遇中焕发新的活力,不仅提升了文化的可见性,同时实现了消费盈利,丰富了产业形态,推动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创新,更为文化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数字化手段克服时空的阻隔,节约成本,拥有更多样的受众,扩大了文化影响力,有效地提升了传播效果,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文化产业也因为其服务经济为主的形态被视为具有非物质经济、低碳经济的典型特征。发展文化产业,似乎成为很多地市践行低碳经济的产业逻辑。

然而,从属性来看,文化产业的产业范围广阔,众多细分行业并不具备低碳属性,同样存在传统行业的高碳现象,甚至更为隐蔽,许多文化产业领域的内部操作与流程也存在着大量的高碳现象。学界、业界曾对文化产业高碳现象有过讨论。2010年,胡惠林强调,“低碳”问题呈现出全球性的价值取向,中国应引进“低碳”价值观,把“低碳”原则应用在当前的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之中^②。同年,《中国文化报》也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实现标准化,并举例说明缺少产业标准的文化产业建设会导致高耗能、高耗材的出现,甚至滋生攀比现象,造成资源浪费,更会对受众消费体验造成影响^③。同年年末,齐勇锋提出,有些文化产品如在消费后不进行科学回收,恐增加造成环境污染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型数字文化消费对Z世代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22BH156)。

作者简介: 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zhangzheng@tsinghua.edu.cn); 刘钰潭(通讯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970543548@qq.com)。

①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08/c_1129904890.htm,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0日。

② 胡惠林:《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转型(文论天地 建言·文化体制改革(2))》,《人民日报》2010年9月21日,第24版。

③ 褚晓琳:《文化产业“促转变”四要素》,《中国文化报》2010年10月20日,第5版。

的可能。陈少峰则将文化产业的高碳现象归于文化制造业,认为应转变“制造业思维”,并创新技术应用以降低能耗,实现低碳发展^①。那么,本文的问题关切在于:随着我国2020年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和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度推进,文化产业领域的高碳现象是否得到解决?数字化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文化产业领域应为“双碳”目标的实现作出哪些新时代的努力?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高碳陷阱”与成因

历经2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审视,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问题。肖昕、韩永锐认为,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多制造,少创造”的现象,其原因在于某些资本过度逐利导致文化价值扭曲、误把原产当原创、文化要素资源禀赋不合理、盗版与侵权现象严重、急功近利等因素^②。本文从聚焦的“双碳”角度出发,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高碳陷阱”分为文化攀比、文化模仿和文化浪费三个类型,进一步阐述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高碳现象以及成因。

(一)文化攀比:低质型高碳现象

所谓文化攀比,是指许多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十分迅速,却未考虑实地情况,停留在低质量的建设阶段,出现明显的文化攀比现象。这里的攀比强调部分地方机构对效果的一味追求,缺乏长远眼光,往往以牺牲有效资源为代价,形成对已有自然、文化资源的浪费,且难以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例如,我国许多地方明明不符合自然生态要求,却要兴建生态体验园区,甚至还会为了吸引关注、制造热点,自主创设各类节日等文化性活动。如兵马俑作为举世闻名的景点,本是西安的历史文化符号,但兵马俑酒店的商家却将大大小小的兵马俑布置在酒店客房内,完全没有考虑到兵马俑自身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其与酒店住宿的矛盾性,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观感,更形成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近些年沉浸式文旅迅速流行,许多城市空间、旅游景区一窝蜂开设网红街区,举办沉浸演出、灯光秀,发展夜色经济,大量的照明设备造成极高的碳排放,许多景区的沉浸式展出、夜色游览项目质量不高、游客寥寥,展出昙花一现,也造成资源的浪费。

文化攀比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部分地方机构未认清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文化表达的社会逻辑,错误把握文化产业的本土角色与地方意义,导致文化产业出现高碳现象。发展文化产业对于弘扬优秀文化、提升地方知名度、增加经济收入具有重要作用,文化产业的开发是地方新名片的打造,更是提升地方文化可见性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吸引流量、制造热点的工具,更不是一味追求流行风潮的途径。当大量未经过论证的文化品牌项目纷纷动工,许多重复文化设施投入建设,这些脱离地方的文化实质、文化底蕴的工程项目往往成为一种巨大的浪费,其违背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逻辑,更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二)文化模仿:隐蔽型高碳现象

文化模仿是一种隐蔽型的高碳现象,是指文化产业在群体层次的严重同质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质量下滑、良莠不齐。这里的模仿聚焦于文化内容,是对于文化形态外在特征的一味追求,并忽视了技术自身带来的资源消耗。文化模仿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的偏向性表达,呈现出虚假的繁荣形势,但实质上是整体行业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可能是倒退。

在文创纪念品行业,许多著名景点的衍生纪念品、动漫角色的手办系列在形式上千篇一律,造型设计相互模仿、设计雷同,质量也参差不齐。这不仅形成制造材料的浪费,也造成游客的视觉疲劳,弱化了景区自身的文化呈现。此外,小到乡镇村落的文艺汇演,大到城市街头的歌舞展示,不同地方的舞台布景常常相互模仿,各个地方的演出舞台相似性很高且演出设计越来越复杂,舞美设计越来越精

^① 转引自郭人旗:《文化产业都低碳吗》,《中国文化报》2010年12月21日,第2版。

^② 肖昕、韩永锐:《从制造到创造——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必由之路》,《民族艺术研究》2022年第2期。

致,整体演出也越发高碳,灯光、升降台、喷雾设备、照明等装备耗电、耗能巨大。此外,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对数字化技术的一味推崇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许多地方在推广区块链技术时造成新的电力消耗,碳排放日益高企;依托媒介技术完成的线上演播需要传统舞台制作成本之外的拍摄及导播成本,实际成本远高于线下演出^①;此外,电子竞技热潮带来的高碳排放、音乐流媒体对碳排放的带动、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造成的资源浪费都需要引起大众反思,这些数字化带来的高碳现象往往不易察觉,成为数字化的隐患。

文化产业隐蔽型高碳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忽视文化产业的科学布局和公共文化服务面向,以及对于数字化技术的盲目追逐。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推动技术向善。文化产业的繁荣不仅依托于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进步,而不应是相互模仿、一味追求流行。这不仅不能推动优秀文化的传播,反而会阻碍更多优秀文化被大众认知。

(三)文化浪费:粗放型高碳现象

所谓文化浪费,是指文化制造流程存在的粗放型高碳现象,并形成了产业发展的文化泡沫。这里的浪费现象彰显了文化产业规划层面的不合理,管理者对产业内部的结构设计、产销体系缺乏完整的认识,其同时也预示着对文化消费层面的考量不足,造成发展协调性的破坏,并影响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稳定性。

近些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各个地方的重视,但技术层面的支持却未能跟上,导致许多开发模式过分简单粗暴,甚至造成了对于原文化形态的破坏,许多文化产品的包装设计、开发推广过于凭借主观意愿,并未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和自身文物的性质。在北京,“故宫火锅”的开设曾引发巨大争议,原因就是其与故宫的木质结构、文物性质相悖,在遭到争议后迅速叫停。此外,文化传承项目、文化商业产品的开发也需要深入了解不同文化项目的特性,需要因地制宜,在保护文化原生性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环境。正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领域,许多非遗传承项目的制造工艺还比较原始,制造流程也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其开发就需要审慎考虑,如河南沁阳盆窑黑陶、浙江棠岙竹纸、四川夹江书画纸、北京门头沟琉璃烧制等制作工艺都曾因造成环境污染而进行整治。

文化产业粗放型的高碳现象源于文化内容生产的前工业时代思维,体现出对文化与环境关系的忽视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失衡,造成文化资源浪费。不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和传播规律是文化产业出现高碳现象的外部性原因。在文化产业行业的诞生之初,对这一行业的管理、建设常常借鉴其他传统行业的管理模式,这些做法在行业兴起之初有助于迅速投入建设,但时至今日,文化产业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与其他行业相异的发展特征,传统的制造业思维已经不适用于文化产业领域的建设、繁荣。文化产业内部具有清晰的文化工业链条,这些工业链条、整体生产工艺流程的改造需要遵循科学的流程逻辑和绿色的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攀比风潮、封闭化、机械化、同质化的文化产业开发模式本身就是高碳开发模式。这些高碳发展不仅浪费了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更浪费了大众感知文化、传播文化的耐心、信心。上述类型的差异归纳如表1所示。

表1 文化产业高碳现象归纳表

名称	类型	核心	实质	重点	角色
低质型高碳现象	低质型	错位化	文化攀比	无本土特色	文化的生产方式
隐蔽型高碳现象	隐蔽性	同质化	文化模仿	决策不科学	文化的内容逻辑
粗放型高碳现象	粗放型	主观化	文化浪费	制造业思维	文化的流程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林凡军、赵艳喜:《演艺业数字化发展的逻辑、机理与问题探析》,《东岳论丛》2022年第4期。

二、“双碳”战略与文化产业的绿色发展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①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②。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③“双碳”战略与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我们反思文化产业的高碳现象提供了适宜的理论视野,更为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

(一)“绿色发展”的内涵及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性

就绿色发展的理论构建而言,胡鞍钢、周绍杰构建了“三圈模型”用以分析绿色发展的机制,即以绿色财富为基础的自然系统、以绿色增长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和以绿色福利为基础的社会系统,每一系统也兼受到另外两种系统影响,三大系统形成了一定的耦合关系^④。绿色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绿色资产不断增值且绿色福利不断提升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和谐,作为主题的绿色发展、作为基础的绿色资产和作为归宿的绿色福利在这一过程中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坚持绿色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这里的“绿色”强调具体发展方式,“发展”是目标^⑤。要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绿色技术的创新与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是关键,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根本,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是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思想障碍,当超越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的人越来越多,才会实现真正的绿色发展^⑥。

我国对于绿色发展的认识经历了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演变。自改革开放以来,绿色发展理念和政策经历了萌芽、起步阶段(1978—2010)和加速推进阶段(2011至今),这一演变不仅展现了我国不断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也见证了生态环境统计监测体系的壮大,是一个不断弥合发展理念和行动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调整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过程^⑦。绿色发展理念中对坚持自然规律、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突出科技创新、强化问题导向的强调,丰富了马克思生态思想内涵、生态人本思想、生态科技思想、生态和谐思想^⑧。绿色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其可推动人民美好物质生活需要、美好政治生活需要、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美好社会生活需要、绿色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实现,形成绿色发展格局^⑨。“双碳”目标的树立对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未来的绿色发展中,围绕“双碳”战略,应立足绿色发展理念的稳固、绿色产业体系的构建和绿色制度供给的强化三个方面,联通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为绿色发展赋能^⑩。

①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https://www.ccps.gov.cn/xsxxk/zyls/202009/t20200922_143558.shtml, 访问日期:2023年5月23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期。

⑤ 庄友刚:《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⑥ 卢风:《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和根本》,《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⑦ 王海芹、高世楫:《我国绿色发展萌芽、起步与政策演进:若干阶段性特征观察》,《改革》2016年第3期。

⑧ 周晓敏、杨先农:《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5期。

⑨ 王丹、郝雨浓:《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与价值探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3期。

⑩ 徐嘉祺、余升翔、刘雯:《“双碳”目标引领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研究》,《理论探讨》2021年第6期。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双碳”战略的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实现绿色发展获得了更高政策层次的发展指引。在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2022)》中,“双碳”战略成为2021年文化产业的十大关键词之一,“健康与生态问题成为关注重点”被视为2022年文化产业趋势预测的十大热点之一,报告强调不断关注人民生活质量,对绿色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文化产业中的低碳模式将获得重点关注^①。赵凯强、范周也将以“生态优先”为特征的“生态效益将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指标”视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四五”时期的几个转型之一^②。文化产业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业界的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须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双碳”战略为现实背景,逐步克服“高碳陷阱”,走上低碳发展之路,更好地发挥文化产业在整体低碳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二)数字治理视角与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

在文化产业领域,数字技术为“双碳”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机遇,轻文旅提升了文旅业的自主性,线上体验释放数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基础设施形成网络化转向,耗能高的文化产品生产转向虚拟消费等等^③。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越发成为助力“双碳”战略实现的重要力量,并逐渐形成构建碳排放计量监测体系、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低碳生产生活体系、碳排放市场交易体系以及碳排放行政管理体系等五条路径^④。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完全解决文化产业的绿色发展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高碳”现象不能完全依赖数字化技术,还要警惕数字化使用不当带来的新一轮“高碳”现象。这种碳排放变得更加隐蔽,带来算力的巨大浪费以及对服务器资源的消耗,让那些本可以用于更高水平社会治理的能源,投入到了这种无谓的文化消耗之中。我们要在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同时,克服“数字至上”与“技术依赖”,推动技术为人所用。在此,本文引入数字治理的视角审视技术对文化产业绿色发展的意义。所谓数字治理,这里的“数字”是指基于智能机器运行形成的数字逻辑(二进制逻辑)催生的数字化状态,数字治理体现着数字要素和治理要素的结合,其彰显着信息技术效用由政府组织内部到组织外部的过程,并同时实现了政府组织内部“赋能”和外部公众“赋权”^⑤。鲍静、贾开从技术(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治理)、行为(数字社会的个体行为治理)、组织(集体行为和组织变迁)三个层次构建了数字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并进一步将技术能力(提升不同主体利用数据资源的能力)、规范能力(引导数字社会中的公民行为)和组织能力(协调不同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视为数字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三个组成要素^⑥。郑磊曾指出,对数字治理的期望应该有所调整,技术赋能不等于技术万能,技术只是“赋能者”而不是“决定者”,数字要以人的感受为出发点^⑦。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文化治理特别是文化产业领域,数字治理表现出新的特征。郑建明、王猛认为,数字文化具有数字技术性、趋同性、共享性等性质,数字文化治理则体现出创新文化管理机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弘扬核心价值、促进文化传播等功能^⑧。对文化产业而言,数字化不等于技术化的产制流程、更不是一味依赖技术发展的技术中心主义思维,而更是一种数字治理思

① 《“2021年文化产业十大关键词”及“2022年文化产业趋势预测”》, https://www.sohu.com/a/526693541_121124723, 访问日期: 2023年5月23日。

② 赵凯强、范周:《中国文化产业“十四五”时期的几个转型》,《出版广角》2022年第3期。

③ 李凤亮、古珍晶:《“双碳”视野下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路径与价值》,《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④ 胡熠、靳曙畅:《数字技术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财会月刊》2022年第6期。

⑤ 颜佳华、王张华:《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与智慧治理概念及其关系辨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⑥ 鲍静、贾开:《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原则、框架与要素》,《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⑦ 郑磊:《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治理研究》2021年第2期。

⑧ 郑建明、王猛:《数字文化治理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图书馆论坛》2015年第10期。

维,是指依托于数字化技术在实现多维探索文化时空表达、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与传播效果、丰富受众感知与消费体验等层面的巨大潜力,进而实现对文化本质为何、文化生产为何、文化消费为何的更深入理解与反思。数字治理思维是对精准表达文化产业内涵的追求、对以往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扬弃,更是对新时代文化产业绿色发展目标的有效呼应。据此,本文将数字化进行延伸,拓展至数字治理的总面向,用以提出文化产业践行绿色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三、文化产业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索

延续数字治理的视角,朱信凯、龚斌磊将人口结构、投资效率以及能源供需等的结构性矛盾视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挑战,并将构建完善政策体系、发展“双碳”产业、培育“双碳”投资市场、加强“双碳”技术研发、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视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①。本文认为,文化产业领域的这种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科学决策、企业生产、消费者习惯培育等方面,并立足于治理模式、生产理念等方面提出解决之道。

(一)发挥数字化战略顶层引领,实现智能治理

解决“高碳陷阱”,不能以“数字化”为唯一药方,正确认识高碳原因与形成机理,寻找治理层次的突破口才是关键。“文化产业数字化是应用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生态系统进行更新再造的过程。”^②技术层面引导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组织层面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环境层面优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环境被视为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实现路径^③。文化产业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宏观层面的战略引领,政府部门应有效运用数字技术推动产业的高效运转,实现智能治理,推动数字化技术真正融入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前沿观察。地方政府既要认识到数字技术为文化产业发展赋能的重要性,也要强调如何赋能、怎样赋能,充分理解数字技术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性。

数字治理的实现离不开对不同媒介技术特性的把握,据此构建科技支撑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提升生产效率、治理能力,同时降低碳排放,加强头部低碳项目的培育,打造示范效应。在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出版行业,绿色造纸、绿色印刷、出版业转型升级被视为出版业的发展方向^④。数字技术也为这一行业增添了许多新的绿色发展路径,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推出的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数字科技与艺术表达巧妙结合的案例,让图画的欣赏不再局限于实体展出,宋朝的风物文化借助数字化场景的呈现栩栩如生,观众获得了沉浸式的穿越感、参与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当时的商业繁荣景象,同时避免了更多的碳排放。在地方文化风情的展示层面,数字技术、文化创意也为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展示方式。在云南,昆明积极打造西部VR/AR产业新高地,西双版纳集合网红直播团队展示音乐与民族相融合的FUNSIX六国音乐现场,玉溪通过“亚洲象·玉溪团”文创展示馆打造“碧玉清溪象往之地”IP。

实现数字治理还需要建立系统化的记录、监督、考评机制,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建立数据平台,厘清碳的数据表现与评价,构建良好的引导反馈机制,激发大众参与活力。政府应将碳的记录纳入平台协同治理,如设置个体化的碳足迹记录体系,搭建碳指导机构,构建碳核算的平台和机制,完善碳的定价机制,并建立第三方的监管平台,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形成多协同治理模式。如国家电投发布的碳普惠平台“低碳e点”、依托支付宝流行且兼具游戏化色彩的蚂蚁森林等平台,通过社会化推广和各类巧妙设计,鼓励个体参与到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的使命中来,在大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中产生了良好

① 朱信凯、龚斌磊:《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双碳”目标的风险挑战与路径选择》,《治理研究》2022年第3期。

② 刘倩、王秀伟:《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问题、响应策略与实施路径——基于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

③ 张振鹏:《文化产业数字化的理论框架、现实逻辑与实现路径》,《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9期。

④ 于殿利:《“双碳”目标驱动下出版业的困惑与出路》,《科技与出版》2022年第2期。

的示范效应。

(二)构建城乡科学布局的空间思维,避免无效竞争

解学芳认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标准体系、结构体系、要素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等子体系构成的集合体,亟须在智能技术与制度创新协同助推下实现六大子体系的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再上新台阶。”^①制度创新被视为与智能技术同等重要的推动力量,即在文化产业的绿色发展之路中,产业发展思想、路线制定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低碳是一种状态、一种标准,更是一种逻辑。在城乡的地方文化性营造方面,地方政府应运用数字化技术促进文化项目的科学论证与产业布局,推进互动式治理,以大数据计算支持科学决策,改变地方政府的文化投资理念,树立科学的文化项目决策机制,同时,还需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结合一定的政策激励,推动绿色发展,营造低碳的产业发展环境,构建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生态,激发地方的内生动力,打造公共精神,实现绿色转型。

在城市的文化建设中,许多城市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以更高效率、更环保整洁的路径传播了城市文化,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经验。在广东潮州,潮州工艺美术元宇宙精品馆在“Meta彼岸”APP上线,成为国内首个“元宇宙”地方工艺美术馆;国家级非遗潮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余燕璇团队计划推出濒危艺术数据要素平台“云间潮藏”,希望搭建一座数字“潮州府城”。湖北武汉努力推动地方文化、古籍善本等内容的数字化转向,并辅以智慧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的融合建设,打造更具数字化气息的武汉城市记忆构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此外,绿色发展也不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正如杭州地铁打造的移动图书馆、铜陵滨江码头图书馆的原生态气息保存也都很好地将城市文化呈现、公共服务和低碳发展融为一体。

乡镇的文化空间构建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更为紧密,在许多乡镇,当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甚至会改变乡镇的文化形态,塑造更具技术韧性、文化表征的“地方”。在广东广州,大源村是中国首个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的“淘宝村”,这里有超过3000家淘宝店,改变了整体的乡镇结构、文化形态;在浙江杭州,镇头村创办了“镇头大队”的品牌,综合采取多种方法,因地制宜,打造独特景观,将闲置房屋改造成辣椒坊和土烧酒坊供游客体验,发起捐赠旧物活动,村内的茶园、梨园划出区域供游客体验,打造出专属本村的文化IP,打造出充满活力的绿色村落,彰显出鲜明的生态思想。

(三)转变企业部门的经济增长理念,推动绿色生产加速

企业绿色转型发展路径在于绿色转型发展方向的坚定、绿色转型发展质量的确保、绿色转型发展效率的提高、绿色转型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绿色转型发展可持续的保障^②。针对文化产业的绿色发展,企业、文化单位应该在生产领域避免低效无用的恶性竞争,增强微观层次的发展活力,树立低碳企业标杆的示范作用,建设低碳人才储备队伍,并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打开绿色生产新思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引导绿色市场发展,打造绿色品牌。

文化产业的绿色生产是低能耗、全领域的生产布局。影视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大量的影视剧拍摄造成很高的碳排放,为了应对这一现象,搭建“绿色剧组”成为十分有效的治理之策。如阿里影业运用LED数字虚拟拍摄完成了《机智的上半场》《你好呀,我的橘子恋人》《重生之门》,节省拍摄经费,提升拍摄效率,打造“绿色剧组”,助力低碳发展。阿里影业还实行“剧组道具回收”计划,回收道具与服装,大幅节省成本,降低碳排放。在日常的文娱活动中,票制销售和展览活动不仅增加了成本,也造成大量的碳排放。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大麦推进数字票务建设,推出无纸票销售的绿色消费,实现碳减排。3D打印技术为废塑处理带来循环经济的优势,文创产品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实现了社会

① 解学芳:《智能技术与制度协同下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构建》,《人民论坛》2022年第5期。

② 于法稳、林珊:《“双碳”目标下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促进策略》,《改革》2022年第2期。

可持续发展^①。

文化产业的绿色生产更是可循环、高效率的生产机制。在浙江杭州,亚运会带来的亚运公园可用于市民的日常运动,体育设施资源的可重复利用设计体现了体育赛事与城市绿色发展、全民健身服务的巧妙结合;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永远的东方红——纪念‘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五十周年”云展览,运用5G技术提供展览保障,综合运用三维建模、全景漫游技术,打造出新的观看服务模式,节省了大量中间环节,成功实现低碳参观和游览。

(四)构建大众绿色消费习惯,推动文化消费的可持续发展

在消费层面,文化产业的绿色发展离不开受众群体的支持。消费者文化习惯培育、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十分重要,这包括绿色发展理念、绿色道德规范、绿色家园情感、绿色生产方式与绿色生活方式的教育与培育等部分内容^②。加强绿色消费宣传、提倡居民绿色消费行为、发挥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和增强企业绿色消费品供给被视为提高我国居民绿色水平的重要方向^③。绿色发展更呈现出诸多哲学层面的启示,即其最终的成功便是人人担当起绿色发展主体的社会责任,导致整体社会文明的“质变”^④。在“双碳”战略的指引下,绿色发展不仅应该实现低碳排放的目标,更应依托于数字技术,达成绿色生活、数字生活,实现消费者绿色消费价值观,打造绿色发展的社会意义。

低碳生活的环境氛围、社交网络是实现文化产业绿色消费的基础。绿色消费的社会性体现在人际互动的网络构建之中、社群氛围的日常营造之中,并为社区活力的构建赋能。如“爱艺之城”正是由淘票票与艺联共同打造的线上社群,其已经成为集线上信息传播、培育用户电影艺术爱好于一体的线上社群代表。绿色发展也为大众带来了低碳的生活节奏和文化获得方式。在安徽省亳州市,本地梆剧团还推出“‘云上’送戏进万家”,将戏剧的演唱借助平台与千万家共享欢乐。在广东广州,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借助广州大剧院“云剧院”平台,依托“5G智慧剧院”,为传统舞台艺术插上科技的翅膀,让家中的观众也能拥有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在首届江西文化产业博览会上,VR艺术会客厅提供了指挥家、演奏者、观众等不同角度观赏音乐会的机会,艺术空间在媒介技术和线下展览设计的作用下彰显更具活力的表达特征。

在文化产业领域,绿色消费的核心是消费者实现购买行为价值的最大化,并达成一定的社会意义,提升对资源利用的忧患意识。已经有许多案例为我们提供了鼓励绿色消费的经验,如针对景区纪念品同质化严重的现象,敦煌和腾讯推出“云采丝巾”,游客可以自行利用敦煌壁画图案元素生成目标款式,并通过“云试戴”生成效果图,再进行购买,极大地提升了纪念品的独特性,消费者可以准确购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避免资源浪费和无效生产。此外,虚拟偶像演艺、购买数字藏品、观看线上演唱会等新型的文化消费行为摆脱了时空限制,也极大地节省了资源成本、人力成本,实现了低碳目标。

综上所述,笔者将本文的论述框架按照现实问题、政策背景、理论背景、治理层次、实践逻辑与作用机制整理成框架图(如图1所示)。文化产业如何在“双碳”战略的指引下实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国家、城乡、企业、个体等层次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目标与实践探索,实现“数字化”成为核心的议题关切和重要的逻辑起点,在不同特征的绿色发展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突破自身,克服文化攀比、文化模仿、文化浪费的现实问题,在多重主体的相互规约中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① 戴勇:《从废塑到文创:3D打印驱动的可持续创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② 吴涛、龙静云:《“双碳”目标下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3期。

③ 安琪:《“双碳”目标下我国居民绿色消费提升策略探讨》,《商业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

④ 张定鑫、张卓文:《中国绿色发展问题的哲学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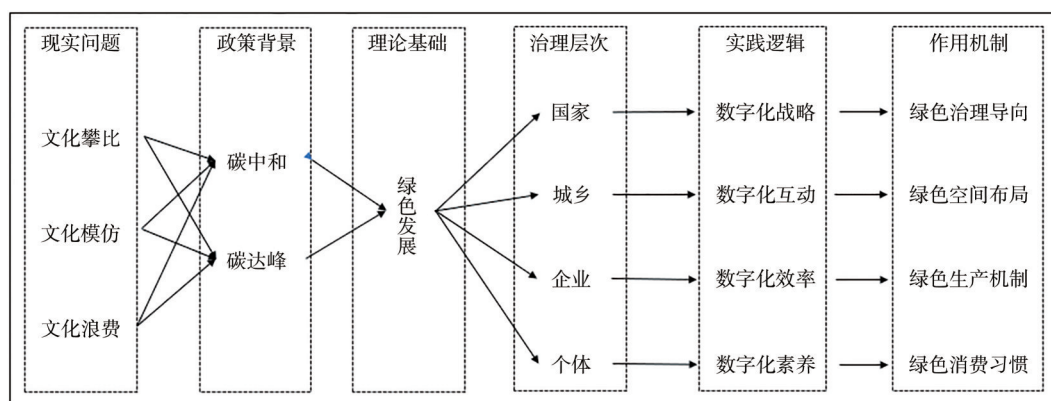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产业绿色发展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语

欧阳康认为,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双碳’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求全面而深刻地转变我们的生产方式,也要全面而深刻地转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①。本文聚焦绿色发展理念,探索数字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文化产业面临的“高碳陷阱”和建设路径,并试图探索数字治理的两面性,即数字化绝不是解决绿色发展问题的唯一良方,并希望以此为参照,反思数字化技术究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探索审视新时代数字化技术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延续数字治理的视角,实现文化产业的绿色发展,需要深刻理解绿色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数字技术的角色,明确不同行为主体的责任担当,并结合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受众的需求变化,方能实现发展目标。从这个视角审视,数字化成为文化产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起点,文化产业的绿色发展则为探索数字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问题域。

文化产业实现绿色发展、走低碳经济之路,这里的“绿色”“低碳”是对发展状态的描述,更是对整体发展思维的树立,也是对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精准刻画。反思文化产业数字化,我们不仅要警惕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新型高碳现象,更应立足文化-技术-消费-环境的多维度书写框架,将文化产业视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技术变迁的一种方法。新时代的文化产业应该更多地成为绿色发展的代表性产业,彰显文化活力,构建美好生活,并拓展绿色发展的内涵,成为实现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Orientation and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Under Context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 A Digit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Zhang Zheng Liu Yut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R.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s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at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promo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cultural field. However, whe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① 欧阳康:《“双碳”目标、绿色发展与国家治理——“双碳”战略及其实施路径的若干前提性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of achieving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many cultural industry projects in China have been constructed rapid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local situation, resulting in a phenomenon of low-quality construction driven by cultural competition. Many type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exhibit a significant group homogeneity, resulting in culture imitation phenomenon which is hardly noticed. Some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extensive production methods, resulting in the cultural waste phenomenon. To solve these “high-carbon traps”,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digital governance provides us with ideas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s above and explo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From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digitization strategy takes the leading role in strategic guidance, including promoting intelligent governance, establishing systematic record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In regarding the carbon as data factors, data platforms are built with effective feedback mechanism which stimulates public engagement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guiding role of green governance. From an urban-rural perspective, spatial thinking for urban and rural scientific planning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avoid ineffective competition, including creating a local cultural atmosphe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cultural industry projects and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scientific validation and industrial layout of cultural projects so as to promote interactive governance, to change the cultural investment mindset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model for cultural projects. From a corporate perspective, the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requires a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business sector,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accelera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avoiding inefficient and useless vicious competition in produc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development at the micro level. model low-carbon businesses should be set. A low-carbon talent reserve team is built.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promoted.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markets is guided, green brands are forged and the green production mechanism is bui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habits can be cultivated,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Green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development mode of production but also presents many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The realiz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economy i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s not only a description of the prospects of future development state but also a new paradigm for holistic development thinking. It also provides a precise portraya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Reflecting on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we should be vigilant about the new high-carbon phenomenon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echnology. Based on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culture, technolo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 we aim to make the new era’s cultural industries a representative green development industry which demonstrates cultural vitality. It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it is going to become an effective path to achieve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ies; Green development;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 strategy; Digital governance; “High carbon trap”

[责任编辑:郝云飞]